

陳寅恪

學術遺產 再評價



盧建榮 © 著

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

盧建榮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 / 盧建榮著. -- 初版.

-- 台北市 : 時英, 2010.05

面 ; 公分

參考書目: 面

含索引

ISBN 978-986-6653-45-2 (平裝)

1. 陳寅恪 2. 學術思想 3. 史學

601.99

99008352

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

著 者：盧 建 榮

出 版 社：時英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88 號 3 樓之 1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2944 號

電 話：(02) 23637348、23634803

定 價：350 元

初 版 2010 年 5 月

I S B N 978-986-6653-45-2

陳寅恪生前譽滿中國，死後猶名震中外

「（陳寅恪）戰時所出版的二本書，與在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其研究之精細，論證之緊湊而具說服力，實前所未見。」
——Denis Twitchett 主編，《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11。

「而社會要從政治史中爬梳而得，觀察一項社會發展，每困於政治史的斷代而未能通其變。在此一鱗半爪的社會史料裡，其能超越朝代更迭，點中演變關節，而為社會史探出蛛絲馬跡如前輩陳寅恪先生者，可謂鳳毛麟角。」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台北：聯經，1988）〈序〉，頁 1。

「陳寅恪先生的理論與方法，在當時是超越時代的，四十五年以來，史學界累積了許多優良作品，其他相關人文社會學科也發展許多有助於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在這些基礎之上，我們遵循著前輩的正確方向，勉力向前拓展。」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台北：聯經，1990），頁 26。

「但是在中國學術界中，王國維以後便很少有人像陳先生那樣受到人

們普遍的崇敬和仰慕了。具體地說，我個人認為陳先生的『學術權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第一是博通多種古典語文如希臘、拉丁、梵文、巴利以及其他中亞和中國邊疆文字。...第二根支柱則是他對西方古典文化的親切瞭解。...第三，陳先生所掌握到的與史學有關的輔助學科遠比同時一般的史學家為豐富。...第四，陳先生最使學術界心中折服的自然還是他在中國文獻資料的掌握方面所達到的驚人的廣度和高度。」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1998），頁 1-4。

「陳先生卓越的史學成就和學術權威，余英時歸因於精通多種古典語文、通曉西方古典文化、掌握豐富的輔助學科知識、文獻資料的博聞強記等四大支柱之上：胡守為認為乃建立在批判地繼承乾嘉史學方法、吸收西方比較語言學方法、運用比較研究方法等特點上；王永興指出陳先生有創新見解自成體系、著重通識、樸素辯證方法、重視形勢對重大歷史事件政策的決定作用、小處著手大處著眼的方法等五大治學特長；李玉梅則歸納出陳先生兼攝中西的史法，反映在史料處理（善用文本、考據多方）、詩文證史、輔助學科（敦煌遺書、域外語言）。此外，還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陳先生治史注重宏觀通識，特別是歷史發展的規律與因果關係，也留意舊史料的廣泛掌握、新史料的運用，以及新問題的提出。既繼承乾嘉考據學的遺風，擅用宋人長編

考異法（即合本子注法），被歸類為史料學派，也吸收西方新史學思潮，號稱為新史家。目前在學界『陳寅恪熱』的風潮中，陳先生的學術光環光芒四射，予以情緒性地感覺陳寅恪『偉大、很偉大、非常偉大』，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陳先生固然是一代典範，但不可能永遠是完美的『不可企及的高峰』。」

「最後，儘管陳先生學說中的某些意見遭致挑戰與質疑，但其所建構開風氣之先的學術典範，所揭發的中古學領域諸多問題，不斷引領後輩學者在其啟示下，追隨其後繼續鑽研。」

——宋德憲，《陳寅恪中古史學探研》（台北：稻鄉，2004），頁 7-8；頁 12-13。

「陳寅恪於抗戰期間完稿的唐史三書，...就方法而論，上承乾嘉考據學之遺風，而求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以考據為求證史實、解釋史事之步驟，然而再就既證之史實，說明其意義，即所謂從史實中求史識。更由史識歸納綜合，為唐史之發展提出若干新穎而啟發的概念，如「關隴集團」、「士族升降」等等，皆為前人所未發。就境界而言，自來治國史者，而以漢族及漢文化為中心，而寅恪研究唐史，不以胡漢為界線，而以胡漢為一體；不僅談胡化的漢人，亦談漢人的胡化；不僅論中原文化之綿延，亦論草原文化之影響。實已擴充國史之視界。總之，

陳寅恪為近代唐史研究之巨擘，殆無可疑。」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台北：聯經，1997），頁 238-239。

「故寅恪作史事之解釋，不作空泛的驚人語；而實之以豐富的史料，以及謹嚴的乾嘉考據方法。故其二《論稿》一出，即能引起廣泛的注意與深遠的影響，予人有耳目一新，發千載之覆之感。」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台北：聯經，1997），頁 116。

「陳寅恪雖重史料但亦講求解釋，二者並重，故史料無堆砌之弊，解釋無空疏之失。在考證工夫上，他不止於校勘辨偽從而建立信史，亦從時、地的確定核以人事，然後斷定真偽。他又擅於錯綜的歷史現象中，探索主要的環節，再從環節的掌握，說明史事的演變，以及旁出的問題，他因而能從「小事」見「大局」。此種尺幅千里的工夫，實是陳氏史學的最高境界。」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台北：聯經，1997），頁 240-241。

自序 解讀陳寅恪符號與正視下一任食人魔史家

「好的歷史家就像傳說中的食人魔，不論在什麼地方聞到人體的氣味，他知道在哪個地方會找到他的獵物。」——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1941）

（一）

「中古」一辭的用語，在台灣指的是二手物件，雖老舊，卻堪用之謂也。像「中古車」、「中古傢俱」都是有商品價值潛力的物件，它們當然無法與全新物件相提並論。但史學界對於中國史的分期上，有著上古、中古、近代，以及現代等四個時段的區分法。中古史的時間斷從西元二二〇年到九〇七年為止，有些史家還把時間往前挪到西元一八四年。一八四年是黃巾之亂爆發，二二〇年是曹丕篡漢建魏，九〇七年是唐朝亡國。亦即中國中古史時跨 687 年到 723 年之久。它是大分裂（184-589），大統一（620-755），以及地方分權（755-907）等三種歷史經驗的連續體。而之中 589 年到 620 年的三十二年期間是隋朝短暫大一統、隨即陷入十餘年內戰的戲劇化演出時期。大唐帝國的一百三十五年承平歲月是後世艷羨的一段美好時光，一般稱之「大唐盛世」。這與約九百年後的有清康雍乾三朝百年盛世，先後輝映，尤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

近一千四百年來的中國史，中國人所獲得的不過是兩個百年盛世，對照來說，其餘的日子不過是無足輕重衰世、或是黑暗時期。如今坊間盛傳二十一世紀是中國又一盛世的世紀，倘若真的實現，那中國人距離上一個盛世，約莫苦等了二百年光景。二千年來中國究竟會

不會步入第三個百年盛世，還在大家期盼中，無法論斷其事，暫置勿論。且回到本書中古史的主題上面來。

(二)

上一回唐代盛世的歷史寫手是傳統史官，這一回唐代盛世的歷史寫手是歷經五四新文化洗禮和現代史學專業訓練的一群史家。這一群史家就是本書所說的，乃是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核心讀者群，他們的治學多多少少受到陳寅恪學風的影響。這是一個面向。但另一個面向是，他們不免受到時代的制約，也有少數與陳學異趣者。陳寅恪對中古史的興趣，在我看來，集中在胡漢文化經接觸而衝突，文化菁英中的門閥貴胄如何受政治打壓，隋唐統治階級的由來和盛衰，以及東晉、南朝漢人偏安政權中的宗教、語言與族群問題等四大項目。這是一個全面觀照的巨視的眼界，無怪乎他的發現或假說會深深影響爾後三、四個學術世代了。他在一九六九年去世，去世迄今陳寅恪現象猶未退燒，即知其魅力驚人。

陳寅恪固然不世出，但也不是身處「時無英雄」的時代，在他生前超越他的大有人在，只是光芒為陳氏所掩，非常不公平。在台灣後學者中，即在陳寅恪生前就有三位之多超越他的成就，只是不為人知。本書即在還這三個人公道，同時也在指出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學界是個推陳出新、競爭激烈的場所，不可能長期被一、二位頭頭壟斷、包辦所有學術榮耀。

本書所要表彰的三位本土史家先後是孫同勛、許倬雲，以及毛漢光等三位。一九六二年，孫同勛推出碩論：《拓拔氏的漢代》，把中古時代胡人文化消失不見的最大案例剖析分明，說穿了，那是鮮卑人自行放棄文化主體性的自毀計畫。這創了人類殖民史的悖論！陳寅恪嫡

傳首席大弟子的周一良發表〈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這篇宏文之時，正值在台灣孫同勛處理同一課題的時刻。孫同勛的用辭是「文化問題」，其實就是周一良所說的「民族問題」，兩人用語雖異，但指涉同一事項。這是六〇年代海峽兩岸學術的一次心同理同。不過，周、孫兩人因政治隔絕，致資訊不通，並不知彼此是同道、而且是知音。

一九六七年許倬雲發表〈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一文，將中國現代史學推到極致，陳寅恪倘若知道，應甘拜下風才是。許氏於此文不僅作出地方勢力研究的範例，而且還提供解釋模型任令後學不斷施以檢測其他案例。這麼重大的學術遺產，如何能漠視？孫、許先後各懷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裝備去治史，結果成就驚人。兩人在此是同一級數，都是利用社會科學輔以治史的示範。這是兩人獨樹一幟的治史特色，許氏於此早為世知，但孫其實比許還早幾年走上這種新式治史之路，卻久不為世所知，我為他叫屈。當時孫年是三十三歲。

最後，一九六六、一九六七連兩年，毛漢光發表〈兩晉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統計分析與比較〉和〈中古大士族之個案研究——王郎琊王氏〉兩文，時齡是二十九歲和三十歲。這兩文在處理中古門閥貴冑如何透過政治過程大肆打造其政治帝國，而且是時當關鍵的第一個一百年。毛氏在運用統計法、使用非敘述史料，以及安排解題設計等三方面，創下了突破陳寅恪矩矱的崇高成就。

以上一書三文是台灣史學史的里程碑，是爾後後繼世代難以超越的一個障礙。直到今天，很少人認識到這裡，只會人云亦云地嘵嘵於口的陳寅恪長、陳寅恪短不已，一竟然無知到寅恪王國早已被孫、許、毛三人給降半旗，逾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不等了！

很可惜，許先生學術主力在上古，而孫先生後續雖有五文發表，

但就此止步了。只有毛氏在中古史的學術續航力最強，終能成其大，日後有四部論文集出版，奠定他在台灣中古史界不世出地位，以迄一九九四年（按：這時尚有二本論文集有待出版）被其宿敵惡搞整倒為止。

如果陳寅恪的學術遺產是為中古史打造一個令後世反芻不已的文化資源的話，那麼，許倬雲和毛漢光師弟所為等如別開生面，為中古史另創一個文化資源。如此一來，台灣有兩個一舊、一新的中古史學術文化資源。這有別於大陸的陳寅恪學統本店只有一個文化資源。這是台灣中古史勝出其大陸同業的堅實憑藉所在。

就在台灣中古史界趁勝追擊大陸中古史界之餘，於二十世紀末十年、二十一世紀首十年短短二十年之間又締造另一個新文化資源來。本書稱之為新新文化資源，如此就比大陸多出兩個文化資源。這個新新文化資源就是由盧建榮所領導的以新文化史研治中古史的新學風，他的影響正由他所主編的《社會／文化史集刊》最新三期（創刊號、2輯、3輯）給展示出來。他主張研究歷史首須觸及歷史的複雜面（必須放棄直線單一觀點思維），其次要換用一批新式分析術語，第三在書寫上要恢復古代兩司馬所垂訓的敘述史學（反對大量抄資料，以及不知剪裁文章的不長進方式），第四在歷史理念上要以追求「神似過去」為目標（改變追求「真相全體」為目標），如此反而逼真。這些新主張亟待歷史教育產生革命方可為功。目前現役中古史家完全昧於上述革新方案，以致少有超越陳寅恪的新手出現。我對目前四十歲以下新手史家寄以厚望，愈快擺脫學閥所施以的過時思維，方能走出陳大師的巨人身影。

這樣的演變是對陳寅恪史學帝國最沉重的一擊！但從另一方面

看，陳氏泉下有知，當欣喜爲後浪所趕過吧。

(三)

在陳寅恪所再現的中古史裡面，有一些文化論述被他的核心讀者群、也就是他的同行後輩加以傳承和演義，產生了與當代心靈的互文性。底下我一一簡述之：

首先，環繞在與國家價值攸關的盛世論述被加碼、並放大。大唐帝國強盛之所由來，或說拜前期一、二百年的胡漢通婚所形成的新民族體魄，或說唐代不分男女均體魄健全，或說寬容的民族政策，或說國防大戰略下的成功殖民主義，或說決策機構和制度的健全，或說前唐諸帝英明輩出等等不一而足。以上林林總總都得一曲之偏。甚至有強調儒家理想在太宗朝的付諸實踐、以及進士科人才登進辦法能有效拔取人才這兩點，更是似是而非之說。但這麼強大的政權緣何衰亡？就比較引不起史家興趣，而少有人論列此事。但還是有兩位史家集中在宦官的爲害這一點，或說宦官控有禁衛軍使士大夫所掌控的政務機構無法節制宦官的擴權，其中有一位更說原爲中央夾輔所設計的藩鎮叛服不常使中史疲於應付。這些只在重複宋人的說法，難謂創見。

其次，陳寅恪最引人注目的一大創見，厥爲唐帝國統治階級中的核心團體不因先前政權動蕩而解體，它一直要等到武則天重用社會新式人才才日趨沒落，抑且中晚唐中央文官層的權鬥是此核心團體向其對手的困獸之鬥。這樣一種文化論述，日後的毛漢光發明一術語以明之，叫「政治延續」，頗能曲盡此中奧妙。這個核心集團，陳寅恪以史家身分命名爲「關隴集團」。這個動人心魄的名詞牽動日後其後輩爲之神魂顛倒久之。或爲它寫前傳，或修正說彼輩從有唐建國至武則天崛起這段時間的真正作爲。關隴集團用今天話來說應叫老牌政治世

家。這個世家集團在陳氏看來，武則天祭出的新式人才登進辦法危及其前途。這是一種世家玩不過新遊戲規則的文化論述提法。這在人類歷史上在許多個案上不失為一項「潛規則」。但毛漢光用更細緻的研究辦法，徹底推翻陳氏此說，取而代之的是，世家應世有方很快就適應變局，變成新辦法的常勝軍不說，原先的老辦法也沒廢掉，只是名額被縮編，他們照樣壟斷老辦法之下的入仕途徑。這就是世家對新舊辦法一體通吃的實情，完全出乎陳氏本人及其粉絲意料之外。本書作者於此另外強調一點，那就是唐政權是個革命政權，而革命政權對世家固權這一點是不利的。唐政權的早期，應該是一部分世家與隋末各方群雄勢力分享政權的時期，是不待武則天崛起已先一波受到打擊。此後世家如何通過武氏當權期間的層層試煉，似乎仍有待深究。易言之，陳寅恪一方面忽視李唐革命對關隴集團的衝擊，另一方面又過度看重科舉取士制對關隴集團的打擊。

接下來是李唐政權內部長安政府與河北地方長期的齟齬此一現象，陳寅恪的解釋是漢文化的中央政府與胡化的河北地方勢力的衝突，是典型文化衝突才造成如此長期的政治對立。陳氏於此用以取信史學社群的證據卻只有屈屈一則資料而已。以文化衝突詮釋河北跋扈所形成的論述深入人心，導致無人敢撓此論述的鋒芒。有位史家還在其博論中以專章重複了此一論點，那是一九六九年。另一史家於其博論中則接受毛漢光指導修正陳說，說成河北部分胡化說，只是該博論未出版，本書並未處理到（按：此博論已於本書製版完成後出版）雖說如此，還是保留陳寅恪說河北有胡化的問題這一看法。這是二〇一〇年。陳氏發表此說是在上一世紀三〇、四〇年代，這樣唐中央與河北地方的文化衝突說竟然持續了七十年的時光，傳頌在讀者齒頰和筆

墨之間。

但胡漢文化衝突說乃胡漢文化接觸的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是文化融合，是陳寅恪學術王國未及之處。然而，台灣的中古史家循此陳寅恪學問的縫罅處而大加發揮。這也算是陳寅恪文化工業的另一途發展。胡漢文化融合最大號的個案發生在北魏孝文帝朝，這裡有三本學位論文雲集此處。有一本論文集上溯至北魏開國至孝文帝朝處。另有一本論文集專章處理前此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胡漢融合個案。實際上，這個個案更早有人以專書形式發表過。又有兩本論文集是在講北魏胡漢文化融合過程中，存在鮮卑人文化主體性問題，易言之，鮮卑人於此並未全面性無條件屈從於漢文化。

最後，陳寅恪零星處理東晉·南朝天師道、南北語言融合，以及族群的問題，原是台灣近二十年熱門學術課題，可惜迄今引起中古史界迴響不大。這部分顯示陳寅恪的超前演出。

(四)

在文化領域上，台灣的中古史家有逾於陳寅恪的發展，在課題的開發上成果斐然，計有花文化、母子關係、夫妻關係，以及禮制文化等，都屬於後天文化建構的性質。這是當年陳寅恪思慮不及之處。在此，台灣中古史家思維雖新過陳寅恪，但方法仍屬陳舊，不免影響到成果的可看性。

在以思維、方法俱新的方式去處理文化課題者厥為盧建榮一人，在他筆底，法律文化、死亡文化、將敵人他者化的文化想像作為、地方群眾的抵抗文化，以及理財工具理性和文化核心價值理性的衝突等五方面，都一一從史學地表浮現，言人所未言。

在許倬雲所開發的地方勢力課題上，三國時代吳地個案的研究令

筆者驚艷、歎未曾有。他影響到毛漢光寫河東地方社會，黃淑梅寫南朝太湖經濟區，盧建榮寫中晚唐淮北地域社會。可惜這個學術傳承不普及，社群中有人故意視而不見，以致影響底下地域社會研究，諸如中晚唐江西、中晚唐澤潞鎮（在今山西東南和河北西南）、中古時代的兩廣，以及晉、劉宋的江北等個案。

根據上述析論看來，陳寅恪挖掘的問題深深吸引台灣中古史家的注意，他們所為在大方向上是附麗於陳氏的發現和假說。只有少數幾位史家走自己的路、問自己要問的問題，大有與陳氏別苗頭之慨。中古史知識版圖也因此為之擴大不少，使不至停留在陳氏創建該領域的時代。總之，一眾史家讀者在讀取陳寅恪符號上，是難以擺脫陳氏對中古史一些大方向的論述的。

（五）

台灣中古史知識製作有著保持與陳寅恪亦步亦趨的味道和衝脫陳氏思維牢籠這兩面性，是本書要揭露的一大重點。本書另一重點要在指出中古史知識社群整體敬業和專業態度不及格這一點。

絕大多數有博士學位的中古史家其產能極低，無法找到新領域，並從中找到一系列相關的題目。整個中古史界耗費一甲子（1949-2009）只生產八十六本書（就中大部分是論文集，而非專書），這些書擁有十年內二千本賣量紀錄者屈指可數，因而整體產值奇小，嚴重違反文化性書物歷史發展的鐵律。要之，產能低加產值小是台灣歷史書籍的特性，非獨中古史書獨然。這是一點。

其次一點是，中古史家不甚遵守學術累積這一工作倫理。所謂遵從學術累積指的是不要重複勞動前人的研究心得。絕大多數學者對於前賢的學術業績在引證上，會因輩分和派系兩因素，而決定引證與

否。易言之，一些托大的長輩往往不引證晚輩學術成果，不同派系的研究心得彼此是互相否認的，常常因人廢言。所以，本書才會說這是小圈圈主義作祟，引證的範圍不是以整體社群，而是以自家派系為界。這是台灣史學社群不健康的所在。

第三，學者的書文多經過層層關卡過濾，照說會使失誤降到最低才是，其實不然。有六七位口試委員把關的博論、有專家背書推薦的獎助出版品、有經秘密審查制篩選的論文，以及受到國科會、教育部或其他獎助單位贊助的得獎作品等，通通逃不過本書作者法眼，裡面論點光怪陸離到沒有證據也可以拿學位並出版。這些書充滿著疏失和思慮欠周等等問題。這就嚴重違反專業守則了。博士學位的獲取意味著當事人從此會寫專書，倘若遵守歷史書是文化性書物的律則，則書寫的結果理應引起大眾注意。結果我們有博士學位的中古史家沒幾個寫得了專書，即令寫得了，也多係翻案文章不說，而且寫不出符合文化性書物的要求標準。

換言之，我們的博士中古史家發現不了新領域以寫書，就算卯足勁寫出書了，也構不到寫文化性書物的標準。這是台灣當代歷史學的危機。陳寅恪的書完全不符合文化性書物的標準，但他至少作到開創新領域。台灣的中古史家少有開創新領域的能力，他們多半只會陳云亦云。

（六）

本書去秋（2009）稿成，爲了接洽出版花費一點時間。最後仍由時英出版社擔綱出版事宜，對於時英負責人吳心健、心頤賢昆仲貢獻文化事業的熱誠，深表敬佩。版面處理與校對承蒙陳佑慎先生鼎力相助，至爲感激。本書的鍵字工作仍由老友吳雪豐小姐督導其事，使在

最短時間內完成一部近二十二萬字的書，其功不可沒。這是生涯第十四本專書，處理了關於書籍史兼閱讀史的課題。

這一年，懸念已久的唐代五部曲出版竣工（*），不想這本書稿也在此時定稿完工，令人欣慰。此外，辦學術雜誌是我多年心願，《社會／文化史集刊》也在同一年創刊。二〇〇九，可說是豐碩的一年。

我常常勉勵學生，要當史家，就要當如馬克·布洛赫所謂「傳說中的食人魔」。這會應驗在下一輪世代上吧？是為序。

盧建榮 序於

二〇一〇年四月清明時分

（*）《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514-755》（麥田出版社 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450-1050》（麥田出版社 2006）；《飛燕驚龍記：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與沒有歷史的人，763-873》（時英出版社 2007）；《咆哮彭城：唐代淮上軍民抗爭史，763-899》（五南出版社 2008）；《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620-860》（五南出版社 2009）。